

高教前沿

2017年第1期

(总第18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主办

2017年3月6日

目 录

◎ 高教视点 ◎

好教育必须挑战学生·····	1
“双一流”建设的一道“必答题”·····	4
“985”“211”直接转？“双一流”建设没这么简单·····	6
“两个一流”建设要防止潜在老问题·····	8
“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学的责任·····	11

◎ 海外检视 ◎

中国为其世界一流大学寻求更好标准·····	15
全球：大学应退出排名竞争·····	17

◎ 调查研究 ◎

“双一流”助推抢人大战，高校各开出什么价码？·····	18
-----------------------------	----



◎ 高教视点 ◎

好教育必须挑战学生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邓晖

对话人：清华大学教授 姚期智

13年前，一个人、一张机票，58岁的姚期智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到清华大学作全职教授。4000多个日夜以来，创“姚班”（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揽人才、攻前沿，这位迄今为止图灵奖唯一一位亚裔得主做的所有事都紧密围绕着一个中心——创建世界一流计算机学科、培养世界一流计算机人才。姚期智说，这是“翻山越岭”的13年。“翻山越岭”中，他对“两个一流”建设有什么体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哪些思索？2016年12月29日，记者走进姚期智办公室，与这位计算机大师展开独家对话，这些温热，带着思想火花的文字，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中国特色”让中国大学有机会迎头赶上

记者：刚回国时，你说常常在想，“一所大学如何能够培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能作出新贡献的学生”。我们正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该如何理解，怎样去实现？

姚期智：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世界一流大学有个普遍意义：有相当一部分学科、院系是世界一流的，里面的老师大部分也要是世界一流。如果世界一流的人聚在一起，其他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他们不会允许非一流成果，也会想尽办法去培养一流学生、设计一流课程。一流大学可以大，也可以小，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是一流，像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但从没人质疑过它是一流。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国外方法不能照样搬来，要想想看中国有什么特殊优势、利用好。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有非常好的人才储备。这不但让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容易做得好，也使很多研究工作在中国推进得更快。中国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在很多时候能为科研发展提供协助。这方面我们已经用“千人计划”等吸引了很多人才回来。

二是中国在科研经费上具有很好的优势。中国这几年经济成长非常快，投入到科研上的经费也逐渐增加。这非常重要。因为科研要赶超，一定需要特别的经费来做事。

三是中国在行政上的执行力非常强。这种在行政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可以使我们在想做的事情上特别有效率。我十几年前开始在清华办“姚班”，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比如二次招生、独立课程等。如果在国外尤其是一些规则比较成熟的学校，即使这件事特别好，它的障碍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些有比较成熟系统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备的科研、教学高水平体制，来创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因为有些特色，我们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



建设“两个一流”，要有耐心

记者：你刚才讲到了很多中国特色优势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助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定会有一些束缚和尚未突破的难点。

姚期智：这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基础的教育教学来说，我觉得已经完成了解放。至少从清华以及其他很多和清华一样比较领先的国内大学来说，很多条条框框已经改善得差不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从教育观点看，怎样让教师有积极性去拓展教学。不是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做这件事，一个学院里能有十几、二十个人把精力很专注地投入其中，而且能合作起来，大学教育就可以办得很好。这涉及一个导向，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奖励方法来构建这样一个团队，去研究当今世界一流的教育教学什么样，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去外面做咨询等事上。这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临门一脚”。

二是从科研上看。科研上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人才，一流人才才能领导、培养年轻人，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些年，国家已经有很大的项目培养、吸引这些人才，但这急不得，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积累，还要有配套措施让他们专心做研究。回国十几年来，我觉得这方面虽然还没有到达一个效率非常高的地步，但也有了很大成效。譬如说在清华，如果一个青年老师的研究水平达到国际水准，他的基本研究经费是没问题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家最需要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快速做起来。现在国家在一些先进、有竞争性和急缺的领域已经在推动比较重大的项目，从这点上来看中国已经到了“内行引导内行”的阶段。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那么理想的状况，但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系。如果你在美国推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科研活动，做起来比中国容易。一是大家距离没那么远，二是如果一个很有威信的人让你来开会，大家都愿意、甚至自费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一个领域的活力推动起来。但在中国就很困难，因为很多尖端人才不在国内。如果中国在尖端领域比谁都做得好，那么大家即便自己花钱也愿意加入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要有耐心。

好的本科教育要让学生发现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记者：你多次提到“人才”。现在无论清华、北大，还是中国其他高水平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努力。你回国原本想尽快打造一支好的研究团队，最后却选择了从本科教育开始。几年前我们采访杨振宁先生，他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不比国外差、甚至要好，你怎么看？

姚期智：国内本科生的聪明才智确实是世界一流的，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学生入学时比美国一般一流大学学生都优秀。尤其是在一些我们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上，比如数学、物理，大学教材有很多年积累，跟世界水平没有大差距，这比较容易在教学上做得好。所以从这点上，我同意杨先生的看法。但在计算机学科或别的前沿学科，你会看到美国大学，每过若干年，就会仔细地、大幅度地调整一下本科教育——要从前沿看课程和教材设计里要删去、增加哪些，这样才能使本科的学生对发展前沿有基本了解。如果学科不与时俱进，很容易在学生毕业时有些该教的东西没有教。

这点我在国外大学有很多感受。我经常看到国内来的学生，甚至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来做研究生时，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况，就是很多该学的没学。还有同样严重的，他们的思维水平和方式



不够深刻。但国外研究生的一些课程或考试，并非死记硬背就行。所以那时我就感觉到国内计算机科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多该教的没有教，二是教学、考试比较注重学生勤不勤奋。真正好的本科教育，是要让学生从中学思维方式转换成大学的研究思维，必须要挑战他们的智力。我一向主张，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发现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将来不管就业还是深造，都沿着这个方向去进行。所以一门课不是人人 100 分是好事。

如果不能让学生发现这些、迎接挑战，就会产生很糟糕的效果——觉得自己不如人，就放低志向，把目标调校成拿到博士学位、找个大公司。我在国外一流计算机系里看到很多印度教授，但中国教授很少。我的感觉是，可能是我们的学生起点不高，所以志向不够。再后来，我回国想要把研究团队建起来，却发现收到的研究生能力不够，开始一年或一年半都在补课。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本科生，这样才能有足够好的一流研究生资源。况且，面对这么好的生源，如果四年后不能保证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那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记者：“姚班”是国内创新人才培养的一面旗帜，它可以复制吗？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姚期智：办好本科教育并不难。这个阶段，学生关键是要打基础，只要把核心学好、基础学透彻，课开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教师团队很重要，只要一个院系有 10 个教授愿意把这件事做好、开好 10 门核心课程就能办好本科教育，这点中国很多大学都能做到。

当然，这在细节上有分别。在“姚班”，课程难度、教学速度比一般本科生要高和快，学生在大二、大三就基本能达到研究生水平。比如我教的大一的一门数学课，在斯坦福这种学校他们要到四年级才学。对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如果按部就班他们会觉得非常没兴趣，因此在本科时就要尽快让他们接触到科研。

再有考试和作业，要让最好的学生觉得有挑战性、非常过瘾。五门课里，我希望你有三门课学得很好、两门不好，而不是五门平均。因为你到外面做工，人家会问你最喜欢什么、哪方面特别拿手，再指派工作，这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还有就是对“姚班”学生很重要的全英文教学和足够多的国际交流机会，让他们在整个过程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国际人才。毕竟，他们将来是要在国际学术圈里和别人竞争，用国际语言和別人打交道。

记者：回国后，你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在国内大学里，很多教授只挂帅不上台，讲课都由助手或者年轻人来做。本该得到重视的本科教学却成了“良心活”，科研才是“最重要”的。

姚期智：一个大牌教授教一门入门的课，是比较好的。他的视野比较广阔，能及时让学生把握到学科方向和定位，所以说资深教授应该教书。这点在美国要求比较刚性，每个老师教课的数量是差不多的。但也有个别情况，如果有时他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对整个学科的成长有更大帮助，尤其是一个大项目刚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柔性处理的。我刚回国花在教书上的时间非常多，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多的老师，很多课都是第一次开，所以我自己先教。现在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方面压力小多了，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打开学生眼界。

至于本科教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想这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离开科技前沿太久，所以那时需要把科研水准快速提升起来。只有科研人员到了一定水准，才有可能教好课，如果根本



不晓得科技前沿在哪，就只能教很陈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有其中的逻辑。但现在重心应该要调整一下了，我相信在国家、学校都重视的情况下，做好本科教育应该没有问题。

(作者：邓晖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月10日)

财政投入将扶优扶强扶特，新一轮高校财务管理 改革如何适应“双一流”建设需要

“双一流”建设的一道“必答题”

令中国高教界翘首期盼了一年的靴子，终于在公众的热议和想象中落地——赶在农历鸡年新年的钟声敲响前，教育部对外发布了“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这标志着继“211工程”和“985工程”后又一个以国字头命名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开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与此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工程不同，“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条件将引入“滚动淘汰机制”。这意味着资金投入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只面向特定高校，原本不属于“985”“211”的高校，也有机会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在以扶优、扶强、扶特为价值取向的“双一流”建设中，现有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能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成为我国推进“双一流”建设中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预算管理中的一串“问题清单”尚待破解

“在取消‘211’‘985’高校后，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时，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以部门指导和行政划分各层次大学和学科等级，固化已有的办学格局，而应在科学推动高等教育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在高等教育有效竞争和合理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要以财政治理的理念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在2016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绘呼吁，高校要不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以适应“双一流”建设的需要。

“取消‘985’‘211’后，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将以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活力的绩效评价体系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有利于创新型高校群的建设。”张绘分析认为，在全国2800多所高校中，有2700多所高校管理权限在地方政府。按照现行高等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高校管理体制，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实行的是“综合定额+专项补助”，即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办学层次，制定学生生均拨款标准，再依据各高校在校生数量，核定下达经费总量。在此基础上，学校依据自身特殊发展需要申请，再由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确定拨款的专项补助。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同等级的高校、不同省份乃至省内不同地区，获得的财政资源都有很大差距。

对照“双一流”建设的“路线图”，高校现有的预算管理制度还存在哪些不适应？包括张绘在



内的多位教育财政研究者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部门预算与高等教育单位预算之间、高等教育单位预算和事业发展之间的衔接有待加强，高等教育预算支出标准的设定、预算编制规范性、预算执行的严格性和内部控制的健全性也有待提高，大量专项实际上也制约了高等教育学校财务自主权。此外，高校科研经费拨款制度重物轻人、人员智力价值得不到体现、高校学费等收费调整受限、高等教育捐赠功能尚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引导资源投入多元化转型是必然趋势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背景下，‘双一流’建设的财政保障将面临较大压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王守军认为，在无法保障高速、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由过去绝大多数高校经费依赖财政拨款，向引导资源投入多元化转型，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趋势。

如何实现资源投入的多元化？王守军建议，“双一流”高校要坚持办学特色，面向国家、社会、市场需要，争取社会各界的投入，政府应通过形成合理的学费价格体系、鼓励开放办学和国际化办学、引导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鼓励高校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投入、放大财政投入效果。与此同时，国家可尝试将资源配置的权力和责任下放给高校，以提高资源投入效率，鼓励高校不断积累资金以缓解资源投入压力。

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源投入和预算管理，为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2/3—3/4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布在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私立的高选择性大学。这些大学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支出结构中用于“人”的费用占较大比重、有持续不断的投入来保障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卓越。而这些一流大学也面临着高选择性大学入学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由优秀师资和生源竞争扩展到其他非学术领域、因控制不力导致办学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

王守军认为，美国一流大学的重重困难，也对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提出警示：我国高校治理改革能否解决软预算、无成本的约束问题？能否避开或减轻这一问题的影响？

除了引导资源投入向多元化转型之外，对现有机制进行内部“挖潜”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重点。张绘认为，今后可考虑建立更加多元化动态化的评价体系、逐步建立绩效预算拨款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等方式，以市场化竞争机制分配科研经费，通过将政府购买服务和绩效预算拨款作为抓手，为推动研究型大学多元发展、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同时，国家可以通过进一步细化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将服务市场、科研产出、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等因素考虑在内，采取客观的分配方式，提高研究型高校经费统筹能力，拨款标准要依据经济和学校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一级财务管理体制高效，还是校院二级高效？

绩效衡量和如何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是“双一流”建设中高校财务管理将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武汉大学总会计师应惟伟认为，高校所具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4个方面的职能，如何统一衡量其绩效，是一个难题。同时，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双一流”的政策刺激下，高校容易过分追求短期绩效，片面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而忽视教学与宽松自由氛围的营造，



这些都可能影响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造成没有长期战略的现象。

华中科技大学总会计师湛毅青则提出，高校预算管理可以“双一流”建设目标为导向，按照“订规划、配资源、核绩效、奖先进”的程序，使得大学整个预算管理形成一个闭环。规划编制时应遵循资源制订规划，资源配置时则遵循规划带动资源，预算内容与规划相结合，实现财随政走；预算对象应充分考虑学校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按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实现钱随事走；预算执行过程中则应遵循内部控制要求，确保资金用于指定用途，实现行随规走；预算执行结果应进行绩效评价，并奖罚分明，实现奖随效走。

经费的使用效益如何提高？应惟伟认为，目前高校财务管理有校院两级财务管理和一级财务管理两个体系，“是不是一级管理体系在预算执行方面更有执行力，而二级体系在资金使用上更有效率？我觉得，基层院系可能更掌握信息，更了解钱应该花在哪里。如果是这样，那么在高校财务管理体制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会由一级管理体系向二级管理体系转变？”

高校财务自主权和问责体系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针对近来国家出台的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下放政策，应惟伟认为政策导向变化不小，科研经费管理如何“放”，需要掌握好分寸。

王守军则认为，该政策的本质要求就是经费使用者守住经费使用“真实合法相关”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可以按照科研需要来使用经费；而经费监管者需要得到经费使用“真实合法相关”的合理保证，其余不再干预经费的使用。因此，在经费使用放权的同时，需要完善经费使用监管体系和问责体系，而不能过分依赖外部控制，忽视内部自律。

（作者：柯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13日）

“985” “211” 直接转？ “双一流” 建设没这么简单

最近各地的教育新闻大多与“双一流”相关。《湖南2020年力争3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 河南高校不能再缺席了》……一时间，各省的高校都掀起了争创“双一流”的高潮，套用网友在留言中常用的一句话，“不想创双一流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这一切都源自2017年新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制定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简称《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按照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机制。“双一流”建设成为了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又一个备受关注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双一流” 怎么选

实际上，此次《实施办法》是对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细化。对于关注高等教育的人们来说是“等了很多年的一只靴子落地了”。

《实施办法》指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办法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动态调整和组织实施作了明确。

外界对哪些高校能入选“双一流”一直多有猜测，此次公布的《实施办法》对遴选程序进行了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开放竞争，采取认定方式确定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将有专家委员会根据《总体方案》要求和本办法，综合高校办学条件、学科水平、办学质量、主要贡献、国际影响力等情况，以及高校主管部门意见，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根据认定标准，专家委员会遴选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并提出意见建议，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审议确定建议名单。

老牌高校依然是支持重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针对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

业内人士评价说，实施多年的“211工程”“985工程”是我国高校汇集办学资源、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集结号”，而“统筹推进两个一流”是中国大学积蓄力量，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

洪文表示，“双一流”高校建设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对未来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实际上，“双一流”与“211工程”“985工程”有很大的关联。“老牌知名高校及传统优势学科依然是各地重点支持的对象。从各省市已经公布的建设名单看，‘双一流’高校及重点、优势学科名单与传统的‘211’‘985’高校高度吻合，这也意味着‘双一流’建设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是‘211’‘985’工程的延伸。”他强调。

安徽省明确提出“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山东的积极支持对象“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驻鲁部属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就目前来看，各省份公布的“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名单确实很多都是原来的“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高校。

发挥自身特色是王道

在各省区市的实施方案中，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需求，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学科建设成为一大亮点。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因地制宜正是“双一流”比“211工程”和“985工程”最大的进步，这让各个高校在发展中能更好寻找自己的位置。

根据目前各省的方案，海南省将利用自身生态优势，重点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国际旅游、热带海洋、热带医药、岛屿生态、教师教育等学科领域。甘肃将立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兰州新区等国家级战略平台建设，明确学校发展定位和优势特色。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将学科建设与产业振兴全面对接，调整学科布局，建



立电力装备、石化冶金、矿山机械、生物制药等若干个支撑学科群，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撑引领作用。

洪文表示，《实施办法》鼓励各地区突出区位优势，重点建设特色学科。这也意味着未来国内的高校发展将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地方化的特点。各高校建设将尽量避免贪多求全、盲目跟风和同质化竞争等原有弊端，而是结合本地实际和产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重点发展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良性高校生态环境。

人才成“争夺”关键

《实施办法》充分肯定人才的重要性，在各省区市出台的建设方案中，“人才引进和培养”都是重中之重。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作为一线科研人员他对《实施办法》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才成了香饽饽”，他说，“双一流”建设计划的进军号角尚未吹响，各地、各高校的人才抢夺战已然“一触即发”。对于高校来说，一方面要从外部引进人才，一方面要保卫本地人才。

为争创“双一流”，不少高校不惜血本到处“挖”人。一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听说评上了长江学者就有点紧张，“因为《实施办法》提出了‘创一流’过程当中人才的重要，所以挖人的要来了”。

洪文认为，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力量，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的中心工作，优秀人才和团队将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当然与之配套的人才流动政策也是必要的，主要是要规范人才的无序流动。”他说。

(作者：李艳 来源：《科技日报》，2017年2月20日)

“两个一流”建设要防止潜在老问题

1月24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标志着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入操作实施阶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依赖工程或项目推动，形成了固定思维，一时间，高校各类争创“两个一流”的策划和活动“蜂拥而起”。本文以冷静和建设的态度，提出在“两个一流”建设中需紧紧锁定大学之本，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良性生态的形成。

“两个一流”建设序幕已经拉开，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自不必多言。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影响包括五个方面。



防止为一流而轻视本科教育

第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在追逐“两个一流”的显性指标中，有意无意地轻视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这是因为大学存在之本的教育很难量化和度量，所以很多“两个一流”指标都与科研挂钩。

例如，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的基本评判指标是：一流的科研生产力（看论文发表数量）、一流的科研影响力（看论文被引用次数和高被引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创新力（看专利数和热门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发展力（看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等等。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含1%）则为世界顶尖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1%至5%（含5%）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5%至10%（含10%）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这些指标很少涉及教育。

在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重建本科教育”近年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教育在“两个一流”建设中的地位，例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就曾发表文章指出：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纵观国外一流大学，不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大学；不论是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还是国际有影响的公立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不将本科生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甚至连大学校友会和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也放在本科毕业生这个群体上。这种现象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因此，在“两个一流”建设中，这一对本科教育的潜在影响不可轻视。

防止浮躁之风加剧

第二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会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的浮躁之风，使原本比较落后或不受重视的教育的处境更加恶化；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在强有力的多方支持下穷于应付，难以精心地专注于研究和创新，发表文章很多，科研成果也不少，但突破性的不多；使本应宁静的大学校园日益失去其应有的氛围。

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各种工程的驱动下很多数量和指标急剧发展，但整个高教届渐渐失去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践行。加之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干扰，教育包括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大学发展战略常被误导。现在高教同行在工作和会议中张口闭口各种指标和不计其数的类似“千人”“长江”等人才数字，少有思考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立足于未来和这个时代大学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好老师。各种教学评估、竞赛和工程层出不穷，但却漠视现在的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大学如何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虽然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我们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的是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量的质疑，以及“两个一流”主导下各高校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等折腾的抱怨。如何利用“两个一流”建设战略规避这样的弊端应引起各方的关注。

防止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

第三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可能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瓦解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强调在推进“两个一流”中突出一流学科建设，这当然有利于让优秀学者找到归属感。但许多



学校为了进入“两个一流”的篮子，不是潜心按照科学规律稳步建设，而是过分拼凑和包装，甚或砸重金从别的高校“买”一个学科来，以超常的方式从国外“吸引”人才；另外，过分依赖老院士、名教授、“海归”的名声和成就或高产能力，而不是重视学科的系统构造和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虽然某个学科可能会突飞猛进，但整个学术生态的提升可能孕育更多优秀人才和学科，也可能使重大发现和大师不断涌现。

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习惯的以工程配置资源的机制、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重选拔轻土壤的各类人才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颗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而这极不利于大学和学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防止错失引领世界的机会

第四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会使中国教育错失千载难逢的赶上和引领世界教育的机遇。这其实也是“两个一流”建设的主要目标，但为何会有潜在的“背道而驰”呢？

现在，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从部属大学到地方本科院校，大家都在热情拥抱“两个一流”，其中的积极价值当然无须怀疑，但我们仍要细究这种热情是否使我们本来在教育理念和操作上已经落后的“以知识和内容为导向”、重应试的“被动式”教育雪上加霜。

面对全球化、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背景，大量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促使全球范围之内不得不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我们向往的许多欧美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尝试以一些颠覆性的改革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斯坦福大学发布2025计划，改大学的四年制为终生制以支持学生的终身学习；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则开始探索深度的跨学科教育来培养通专结合的人才；以开创美国通识教育闻名的哈佛大学也在重新反思其通识课程的合理性并作出重要改革；更不要说像高教届新锐密涅瓦（Minerva）大学可能给整个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

反观国内很多大学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绝大部分还在以过去欧美高校实行的“研讨式”“小班化”等为目标，调整不合时宜的体制重新梳理人才培养的链条，让很多改革停留在枝节和过去，少有针对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做出变革的例子。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个一流”建设需要引导的是对教育变革的关注，对教育探索的投入，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对教与学模式的重塑，而不只是在一些指标上把一部分大学和学科搞成“世界一流”，更不是把教育领导者、院士、大教授和老师的能量和眼光拴在为了一流的一些“数据和排名”上，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错失与全球一流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探索未来教育、赶上世界发达教育理念并有可能引领未来教育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防止误导一般院校的特色发展道路

第五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一些一般院校的办学目标和特色发展道路。

本次“两个一流”方案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世界一流学科”给了很多整体上不强但学科特色突出的地方高校以机会，但现在高校判断学科水平的指标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上也是一个对学科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并不关注学生。因此，可以预见，这一惯性



评价体系会把更多的高校纳入统一的学科和学术建设轨道上，让那些过去无法企及“985”和“211”的地方院校把注意力放在少有的几个有希望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ESI指标上，进而忽视其特色办学和教育育人的主要任务。

上述这些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如何利用“两个一流”建设解决这些“顽固不化”的老问题，应该成为国家教育战略关注的新问题，而不是等到“两个一流”建设完成后，再以另一个工程来面对这些老问题。

(作者：席酉民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2月9日)

“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学的责任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也是教育学科本身改革发展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换句话说，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教育学应该做出什么贡献呢？教育学本身如何能够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呢？中国的教育学本身能否成为世界的一流学科呢？

我想首先谈“双一流”的内容。“双一流”是“985工程”的一个延续，所以国务院的文件讲的是推进，不是说开始。从历史的角度说，“211工程”主要是建设重点学科，后来有一个“985工程”，是从1998年5月江泽民在北京大学讲话以后开始实施的，到现在为止进行了三期。第一期就是北大和清华以及“C9”等大学开始建设；到了2004年，有些学校要求进入，政府压力很大，甚至是省里主要领导出面支持，就扩大了十几所，这就是“985”二期；后来十几所还不够，又扩大到30多所，就是三期建设。后来有一段时间“985工程”稍显沉寂。到2015年的8月18日，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双一流”的概念，叫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方案，国务院是在2015年10月24日明确统筹推进这个主体方案。“双一流”的内容很丰富，核心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根本是立德树人，战略是支撑创新驱动的发展，导向是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支撑。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双一流”和“985工程”有什么不同，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人会这样来问，或者我们自己在研究的时候会思考，“双一流”与“985工程”之间是连续性的吗？或者这种连续性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们之间当然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更重要的连续性不仅仅是“985工程”和“双一流”之间的连续性，关键是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连续性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之间的连续性，换句话说，20世纪末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和今天发展建设的要求的格局、目标和面临的挑战，



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节点，是连续的并且有所不同的，充分认识这种不同是非常重要的。

在“双一流”和“985工程”的区别中，至少有三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从影响力到竞争力，换句话说，在“985工程”里面，包括在一期、二期和三期的若干主要文件，包括教育部、财政部的文件中，在政策分析的过程中，它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也偶尔提到了竞争力，但是在主要的实施文件中讲的都是影响力，我们一定要很严谨地做这种语词和概念的分析。而“双一流”的概念不仅是影响力，而且是竞争力，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教育部和财政部关于985三期的文件，讲的是一批学校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双一流”的文件怎么提的呢？它讲的是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是影响力，一个是竞争力，这两者的含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竞争力。关于影响力的六个指标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竞争力有两种竞争力，一种叫做名次的竞争力，所谓名次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的《泰晤士报》的竞争力排在第几，这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又比如说我们的游泳、跳水、乒乓球，在国际上都能拿到好的名次，这都属于名次的竞争力，这个很重要，相比于我们过去根本与金牌、银牌、铜牌无缘，与升国旗无缘，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竞争力是二等的竞争力，第一等的竞争力是话语权的竞争力，换句话说即使你在游泳比赛中拿到金牌、银牌和铜牌，但是整个游泳比赛的规则不是你制定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说一流的企业做的是标准，二流企业做服务，三流企业做产品，难道我们的教育不也是如此吗？我们没有话语权，尽管我们乒乓球拿的是世界第一，可是乒乓球的规则制定权还把握在别人手里，以至于一会儿换一个黄球，一会儿要换一个大球，好在我们实力不赖，所以再换我们也不怕。但是毕竟没有话语权，也正是如此，所以在“双一流”的文件中是这样提的：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定规则的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在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上，我们教育学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在国内去争这样的一些名次，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的学科，能不能在规则的制定上，在话语权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在传统国际发展的赛场上，规则别人都制定好，我们可以加入，但必须按照已经设定的规则来赛，就像我刚才说的游泳等等，没有更多的主动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的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如果我们没有一招鲜几招鲜，没有参与主导新赛场建设的能力，那我们就缺少机会，就什么都没法说了，永远是二流的国家。

第二个不同，从跻身世界一流到中国特色。什么叫跻身呢？就是别人已经排好队了，我们挤进去一只胳膊一条腿或者半个身子，这是形象的说法，学术的规范的说法是，别人有了规则，我让我自己去符合这些规则，达到一种共性的要求。换句话说，跻身一流追求的是一种世界一流的共性和一些普遍的标准和要求，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你如果都没有规范，谈什么自己的特色呢？所以首先是追求共性的跻身，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一些世界一流的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上居于前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追求中国特色，而这也是“双一流”所强调的，或者说在“985工程”基础上的一个重



大变化和进步。江泽民在北大 100 周年校庆讲的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习近平讲的是，我们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创新驱动来建设。这两句话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是国家建设和发展要求我们要有一流大学的共同标准，但也要有中国的特色，有中国的个性。

第三个很重要的不同是，从桥梁到推动。“985 工程”强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江泽民讲的是，一流大学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双一流”的指导思想讲的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你怎么去推动它往前走，靠什么去推动它，而不仅仅是参与到这个行列中，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推动方式，增加规模，扩大比例，增加体量，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增加，当然这也是一种推动，但是我觉得这种推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品质和类型的丰富，要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要有中国独特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中国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真正去丰富、去发展、去推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教育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学，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如果一个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在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上提炼不出自己的东西，那就真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那样，不能真正形成中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挺刺耳的，但是不要把刺耳仅仅变成一种刺耳，而要变成一种动力。

那么中国教育学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形成和总结出我们中国独特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也不是一句调侃的话，而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安身立命的一句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教育学有什么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吗？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吗？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非常坦诚地承认，这两年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可谓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少数做得好的也被认为是为外国学者服务。经济学尚且如此，教育学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反思，教育学可能做得比经济学好一点吧，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学，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价值，因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价值特色，怎么能够培养出真正忠于自己国家的人，培养出真正创新的人才，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成为真正的教育强国呢？一个没有自身独立性的教育体系，一个仅仅靠外部的教育思想和模式的教育体系，能够培养出真正认同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才吗？能够真正得到国际认可吗？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我们的一些体系，我们的一些制度，我们的一些做法、一些政策，实事求是地说，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过去有个学者叫陶希圣先生，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他在中国学校之教育历史的考察中说，如果要去考察中国的教育制度，包括制度的影响，一定要看欧美、看日本，因为大部分是从它们那里传过来的。但是你要真正了解中国教育自己的东西，中国教育自己的特色，若要深察其实际，就要了解和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研究这些历史文化在学校中的积淀。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启示。举个例子，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德育？大家可以看，在西方很多德育的内容是靠什么去解决的呢？是靠教会去解决的，包括一些信仰的问题，但是中国没有这种教会，中国学校里也不允许有宗教的东西，所以中国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过去西方教会承担的职责，特别在信仰和理想、人格方面的东西，所以钱穆先生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是中国教



育和西方教育很不同的地方。

我再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为“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意思是西方的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认识，而且要修养自己，他说学者自身之修养是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的部分，是儒家哲学之重心所系，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为缺乏个人的修养，换句话说是一种品德的培养，这也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当然我在这里谈的只是一个粗浅的体会，也是给我自己提出的一个任务，但是我也很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向各位专家学习，也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呼吁各位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共同思考和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建设作出教育学的贡献。

（作者：谢维和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7期）



◎ 海外检视 ◎

中国为其世界一流大学寻求更好标准

中国已建立了其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阶段。2015年10月24日，中国国务院（State Council）正式颁布一项计划，明确并专门阐述有关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计划中也包含了时间表。除此之外，这份文件旨在打破分化现有“卓越”计划（例如“985工程”、“211工程”）的界限、调和并巩固各类资源以支持这一努力。

在 21 世纪中期进入全球排行榜前列

对于这一目标，文件制定了以下时间表：到2020年，一些中国大学和学科领域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到2030年，更多大学和学科领域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中一些将在世界排名中位居前列；到2050年，凭借由顶尖大学和学科领域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将成为教育强国。

中央和当地政府承诺通过为少数学校汇聚资源以支持这项工作。从2016年起，竞争性拨款的新周期为五年一轮，这比“985工程”现有的资助周期（三年）长得多，新的拨款方案允许获得资助的学校更为灵活且自由地使用获得的资源。那些成绩优异、实力雄厚、表现卓越的大学将获得这些资源。在这项工作开始时，财政部和教育部于2015年11月17日公布了针对中央直属院校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领域的奖励资助计划。这一资助汇聚了之前分散到各个出于比较目的而建立的项目的经费，它被明确规定用来提升大学卓越水平，该水平以世界标准衡量。

较之于以往的做法，这一政策举措强调透明度并需要对资源展开竞争，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结果。它把世界一流的院校和学科领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可能包括比以前卓越计划（尤其是在“985工程”）选择出来的大学多得多。这一新举措是为了挑战那些大学的权威地位，从而激发以有效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激烈竞争。

中国大学凭借什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完成这项工作并非易事。按理说，有关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准则的争论还未解决。尽管如此，全球排名仍是学校宣称自己具备世界一流地位（位于大学排名前50或前100位）最为有力的例证。全球排名高度依赖科研产出和成果来对大学进行“世界秩序”的归类，这似乎是中国渴望成为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这项事业的逻辑和战略。

过去十年中，大量资源投入到了中国顶尖大学中，以提升其科研基础设施和能力。2014年，30所最富有中国大学总支出的平均值高达10亿美元。考虑到大学资金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一水平，在系统层面上，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大学的支出高于这一水平。仅在五年前，拥有此种资金水平的中国大学不超过五所。较之于西方大学，中国大学通常在教职工补贴和学生服务上投入较少，那么，大量经济支出直接造福了科研或是科研相关工作。



新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 2030》(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 指出，中国已位列全球研发支出第二位，所占全球份额为 20%，次于美国 (28%)，但超过欧盟 (19%) 和日本 (10%)。此外，中国在知识生产中快速前进。中文出版物现已占全球出版物总量的 20%，而这一比例在 10 年前仅为 5%。“自然指数”(the Nature Index) (统计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数据库) 表明，近期中国科研产出在该指数上的增长已超过其他国家，在 2012~2014 年间，高水平科研文章增加了 37% (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下降了 4%)。毋庸置疑，中国顶尖大学是该国研发绩效快速进步的助力。早在 2007 年，中国大学的研究者就称他们正把 85% 的全国出版物提交到了国际期刊中。

中国需要自己的标准来评测大学成功

在个别大学中，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反映了巨大的进步，但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并非如此。换句话说，一些中国大学攀升至排名顶端是一回事，而中国的教育系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又是另一回事了。明确的说，个别院校不能成为“游戏改变者”，但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大学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对比中，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功不仅利用了各大学的绩效，也 (更为重要的是) 利用了规范性模型的优势。英国大学模式以通识教育理念为特征；德国模式是为创造知识而提升科研理念；美国模式则是结合了以上特点且强调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那么，如何定义一个新兴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呢？新的蓝图需要顶尖大学追寻世界一流地位，与此同时又发展“中国特色”。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为其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工作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支持中国大学的全球角色以及文化独特性。现在是否存在一个中式或儒家大学模型还存在争议，但是，中国大学拥有强大祖国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它们的确表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大学的独特性。例如，中国大学试图在国家 and 地方议程中阐明政策规划并解决国家和地方需求。这种政治化的社会参与通常吸收了大量资源，无论是人力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现有的全球排名无法评测这些贡献，因此，中国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目前完全被低估了。另外，自 30 年前解除对出国留学的限制并 (着实) 鼓励出国留学以来，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人才流失，估计约有 300 万中国知识分子居住在国外。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大学开始从人才循环中获利。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学术发展和竞争上有着宏大的国家议程，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内，可以说再没有哪个系统能与之媲美。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国际指标能呈现出这一议程或是时间表的重要性。中国的成功或许是巨大的，但其成功并未体现在把中国大学带入现有全球排名更具竞争性的位次中。与此同时，政府的意愿则是体现了不同的议程且将得益于明确的“中国标准”，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更为清晰的方向。

(作者：查强 来源：《国际高等教育》，2016 年 12 月)



全球：大学应退出排名竞争

近年来，全球大学都热衷于在各类排名中争取更高的位次，但我们认为，大学应当退出排名竞争。现今广为人知的三个主要全球大学排名，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主要对两项指标进行评估：科研产出和学校声誉 (ARWU 除外)，而这两项指标在 THE 排名与 QS 排名中的比重却不尽相同；THE 排名对教学质量的评估方法也遭到质疑；大学国际化程度评估更是重数量轻质量，因而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例如瑞士。各种版本的大学排名日益增多，但大学排名的评估方法却依然饱受争议。

据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 (World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 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超过 1.8 万所，但只有极少数高校会出现在排名中。可见，大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跻身大学排名本身就是一项成就，而在排名中维持甚至提升名次则更为不易。实践表明，没有大量的财力与资源作支持，大学几乎不可能提高自己的排名。

过去十年来，大学排名已经对高等教育与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高校对科研的过度重视则造成了教育使命与排名竞争之间的关系冲突。在政策决议和资源分配中，教学、本科生以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对象。一些大学为更好地满足排名中的某些指标而重新调整学生的入学标准，从而偏离了自己的办学初衷，还有一些大学为提高排名担负巨额债务，也只是换来统计学上的微小变化。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学生掌握未来人生道路上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而大学排名竞争不利于该目标的实现。

显然，大学排名已经成为影响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大学的主要追求不再是教学质量与学生成就，而是排名所反映的威望和声誉。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国际性的研究证明，当前的评估指标与权重是衡量大学排名的可靠标准。对于在排名中处于中下游的高校来说，大学排名带来的困扰则更为严重。对于这些大学和他们的政府，我们想说：请专注于学生的能力提高，帮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与就业中获得更好的发展，不要让学校成为满足各种排名指标的机器，为排名耗费再多的精力和资源，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翻译：谌思宇 来源：《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2017 年 3 月)



◎ 调查研究 ◎

“双一流”助推抢人大战，高校各开出什么价码？

“大量普通高校教师是不流动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亮告诉财新记者，高校大手笔竞聘的多是一系列“人才计划”入选者。

马亮指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若仍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为依据来排名，“‘数人头’的做法或将助长高校间的恶性‘人才战’”。

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双一流”实施办法。接棒“985工程”、“211工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幕。

这一新轮大学重点建设工程以5年为一个周期，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注重学科发展，“以绩效为杠杆”，并将对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重心。在2月26日财新记者参与的一个学术论坛上，广东某大学学者在做完报告后表示，其所在的高校为响应广东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正在广揽人才，在校教师引荐有道也可获得相应奖励。“打个广告，我们学校招聘青年人才，待遇优厚。”该学者说。

高校抢夺“帽子”人才

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在大学之间早就不鲜见。

高校抢的是什么人？“例如科技界常说的‘四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教育部的青年长江学者，以及中组部的青年千人和青年拔尖人才（简称“小千人”）。”马亮告诉财新记者，主要是名列“一系列高端人才吸引计划”的高层次人才，更高级别的还包括长江学者、中组部的千人计划（简称“大千人”）学者等。

此前，中国高校教师多为事业编制，但“‘铁饭碗’体制缺乏激励”。为鼓励大学改革，延揽人才，中国近年开启多项高层级人才引进计划，并配套以能进能出、按课题取酬、按成果发奖金等人事制度改革政策。

“人才引进属于政策‘特区’，可以执行特殊政策。”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帽子”学者稀缺，人才竞争出现空前激烈的场面，针对高层次人才学术扶持政策逐渐“功利化”，“‘帽子’演变为人才定价工具”。

“高层次人才在各个高校之间腾挪转移，不仅打破了常规人才管理的制度禁锢，而且令兄弟高校之间‘剑拔弩张’。”马亮在公开撰文中指出。

北上广以“房”引人

“各个高校几乎都‘倾其所有’。”《文汇报》近日报道，华东政法大学在2017年的师资招聘中开出“最高房贴800万、最高年薪100万”的优厚待遇。



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高校青年教师向财新记者透露，目前在中国大学间，“帽子”的平均定价水平大约为：“长江”“杰青”学者“年薪 100 万元+1 套住房+200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而凡每年有能力申请到省部级以上课题和发表两篇 A 类论文的学者，定价组合为“年薪 80 万+1 套住房（或 200 万住房补贴）”。

马亮告诉财新记者，为了延揽稀缺或特别需要的人才，有高校不惜在待遇上“一人一议”。

“一是年薪，可以高达上百万元；二是安家费和住房补贴，也可以达到上百万元。”此外，理工科的科研经费也可以达数百万元，“对于建制制的团队转移，议价方式更是如此”。

“吸引力最大的是房贴。”马亮透露，在房价高企的北上广地区，高校竞价人才还开出住房补贴的“杀手锏”，“不这样做很难有竞争力”“高校分房已是过去式，只能货币化补偿，或低价购置学校住房”。

财新记者梳理发现，东部发达地区知名高校为吸引人才不惜重金。

位于广东的暨南大学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分别开出 200 万和 100 万“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的条件。华东理工大学则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提供 120 平方米以上的高标准教师公寓或 60 万元以上住房补贴（含安家费）。华东师范大学为“青年千人”入选者提供一次性免税的住房补贴 180 万元。

张端鸿告诉财新记者，人才的住房由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和高校三者共同分担的做法在广州等地也存在。

深圳则“下血本”吸引人才。根据该市于 2016 年颁发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未来 5 年将筹集不少于 1 万套人才公寓房，供海外人才、在站博士后和短期来深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租住。

若属深圳认可的杰出人才，在引进时可享受 600 万元的奖励补贴，或选择面积约 200 平方米免租 10 年住房。若选择后者，在深圳全职工作满 10 年且贡献突出并取得深圳户籍的，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或给予 1000 万元购房补贴。

“双一流”或彰财力优势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创建的背后，本质上是人才竞争。”张端鸿认为，从薪资待遇、发展机会、学科平台等各方面看，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重镇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

而像广东等若干原本高等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则希望在此轮大学建设中“补短板”。

广州大学曾在 2016 年底一口气拿出该校 14 个院长的职务，向海内外进行公开招聘。

大手笔后的背景是广东近年对高等教育的大举投资。广东已投入 50 亿元和 80 亿元，分别用于域内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

2016 年底，广东省教育厅又向媒体透露，该厅已与茂名等 9 个地市、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等 11 所高校，签署了省市共建本科高校的协议。在“十三五”期间，广东省财政和各有关地市的支持资金共计将投入 100 亿元。

东部沿海的其他地区建设大学也不乏强力。山东将在“十三五”期间筹集 50 亿资金支持“双



一流”建设。江苏则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提出，从2017年起，对进入全国百强的省属高校，给予每年每校1亿元左右的资金支持。

“在争创‘双一流’的背景下，可以说是得青年者得天下。”复旦大学人事处负责人钱飏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海外高校青年人才已成为各高校争夺焦点。中国高校目前已通过赴海外高校招聘、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刊登广告、海外校友会、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延揽留学青年人才。

海外“征战”也以发达地区最快。2016年5月，广东高校首次组团到美国哈佛大学举行高水平大学高层次人才招聘会。据新华网报道，招聘会上与高校达成初步意向的共有150人左右，大部分是美国知名高校教授、青年教师、博士后等。

(作者：陈少远 吴迪 来源：财新网，2017年2月28日)

